



電信工會藝術氣息濃厚的會議室。

〈人物特寫〉

掀起反「公營事業

私營化」浪潮的舵手

專訪中華電信工會理事長張緒中

/ 郭慧玲

公營事業民營化的浪潮自 [?]1992年《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條例》在立法通過後就悄悄地襲捲侵蝕我們的國公營事業體，將原本具有濃厚的社會主義色彩的國公營事業，用公開釋股或拍賣的方式移轉至私人資本，或是開放外資進入經營原為獨佔的公用事業，這些做法都是企圖將台灣的資本市場更進一步地推向資本主義的自由化、全球化。

在這一波對員工來講是危機也是轉機的民營化浪潮中，我們驚訝地看到電信工會掌握這一波脈動，不但在工會的改選上，成為國公營工會中第一個由勞方掌握的自主性工會；更具有前瞻性地提出對抗私營化的最有力訴求——產業民主制！

本期的〈人物特寫〉，就為讀者將焦點集中在引領這一波國公營工會反私營化抗爭的中華電信工會理事長——張緒中。

四十歲不到的張緒中，參與工運卻已屆十年！早期在工運蓬勃的高雄地區，他引領電信員工發起一波又一波的運動，與現為電信工會總幹事莊炳棠及英年早逝的朱寶華，並稱「電信三劍客」。電信工會的自主化，乃至於國公營工會的自主化運動，他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本刊對其的訪談就從他發起籌組國營工會第一個體制外團體談起……以下就是訪談內容：

□可否從個人參與工運開始談，什麼樣的機緣？籌組什麼團體？發起什麼運動？

■最早參加工會是民國76年，那一年解嚴，而且勞委會剛成立，那年電信工會是全台灣國營工會第一個改選的，日期是7月7日，我們說是七七事變。那時沒有什麼選舉制度，隨便填一填就當選。

那時候完全沒有什麼工運理念，只是對現狀認為怎麼這麼不合理，然後就出來選，選上以後剛好有一個機緣：宣佈解嚴，我們剛好是第一個開代表大會，全國都把焦點放在我們身上，剛好電信工會又出了三位民意代表——立委王聰松、吳勇雄、國代徐美英，那時候整整開了五天，可以說是工會有史以來開五天大會，從早到晚，提案就五百多件，等於一下子洩洪了，謝深山在我們開大會時，全程參與，那時他還不是全國總工會的理事長，還只是勞工立委，因為全總是在1988年改選的，陳錫淇是那一屆立委落選，國民黨就屬意謝深山了，那部分就造成大家比較注意電信工會，其實那時候代表大會雖然很紛亂，但是國民黨仍能 handle，對結果並沒有太大意義。但開了之後，有些事情就有改變。

那時候有所謂實習員佐，他們是從成功大學或公立高工（商）建教到電信局，進來之後，做十年和做二十年薪水都不會變的，永遠停留在那邊，算是勞基法的不定期契約工，但他比不定期契約工好多了，不定期契約工是算日薪的，那時一天才250元，實習員佐的待遇是比照電信局正式員工，只是他沒有公務員的身份，所以年資也不能累積，也不能提敘，等於是在一個企業中存在著根本沒有誘因的工作環境，這樣的人差不多佔二千多位，我也是其中之一，那時候我們在10月31日（1986年）成立實習員佐權益促進會，是國營事業或交通部管轄內第一個體制外的團體，這促進會成立時我是擔任總幹事。那時候名義上是解嚴，但實際上管理階層觀念和行動上是高壓。那時候透過王聰松辦說明會，陸續在北中南成立分會，之後資方找我們談判。剛好遇到一個關鍵點——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逝世。在這之前我們本來準備在1月11日，民進黨在抗議司法不公之際，

我們那時候剛好準備走上街頭。那時候真是風聲鶴唳！因為還沒有國營企業員工走上街頭，在那過程我們的會長就以住院方式缺席了。我在無形之中，就開始主導這個團體。這樣一路走來，那個促進會是造就我、訓練我的一個最原始的源頭——訓練我跟媒體、跟民意代表的接觸，陸陸續續也接觸一些工運的朋友。那時候還是非常幼稚的，沒有所謂的工運理念，推動過程中也有看到收買、施壓、恐嚇，但這段時間真正讓我認識什麼是真正的工會，成立這個體制外團體後，也引發像朱寶華就出來組織「不定期契約工聯誼會」。

因為實習員佐這邊雖然沒有資格，但是至少比照一般的電信員工去支薪，他的薪水還算是很高，可是同樣兩個都是不定期契約工，朱寶華他們一天兩百塊，請假要扣錢，等於是臨時工，以前叫臨時差，也激發了這些人認為我跟他們做同樣的工作，領的比他們少，他們都可以爭了，當然我們也可以爭。這樣激發了他們的權利意識抬頭，我們扮演了啓蒙、發酵的功用。後來郵局也成立士差聯誼會，還有台鐵員工聯誼會、火車司機聯誼會、台電員工聯誼會。倒不是我們這個團體對他們提供了什麼幫助，我們提供了一個觸媒的角色，讓國營企業的員工了解：第一、我們的權利自己爭，第二、在體制外我們可以籌組團體，發揮工會的作用，團結的少數永遠勝過鬆散的多數。最主要的是實習員佐權益促進會有爭到應得的權利，我們可以跳級了，而且從勞基法實行開始補。如果沒有結果還另當別論，就是有結果，才激發了其他團體要起來爭。

電信局那時候有大約五分之一是不定期契約工，朱寶華他們那個團體就有七千多人，全台灣工會內有聯誼會大概就屬電信局最多，有八、九個之多。幸好這十年做了整合工作，才有今天電信工會的執政！為什麼說那過程是累積，不是說一開始就有理念才來搞工運。正義感當然是有的！那時候不知道什麼是怕，江湖路走多了反而會怕。那時候不知道早一、兩年出來人可能就會不見了，現在回想起來有這可能，因為在我們執政過程中，就遇到了！它是從收買到黑道威脅，再到

司法迫害這樣一個過程。在我之後就有六、七個案跟著來。

□從籌組實習員佐權益促進會到捲起風潮過程中，有沒有遭遇到資方用扣薪或記過等管理手段來阻撓？

■可能我的成長背景關係沒有遭遇到大的迫害。我是芋仔蕃薯，事實上過去我是非常忠實的國民黨員，他們從來沒有想到張緒中會去變成體制外的領導人，他應該是為國民黨辯護的人，所以他們應該有考慮到這個孩子工作認真。非常盡職，所以我還很幸運。

在那過程中，有一次要走上街頭，1月11日司法節的時候，他們下了一個文，「公然聚眾，屢訓不悔的人予以免職」。這個文是因為我而下的，我的主管拿這個文給我看，等於是告訴我：小心！你今天出去，可能會沒頭路。當時我的主管拿給我看時，我還問他這幹嘛！最後沒事，所以我還算是幸運，可能過去我工作態度。我的做人得到肯定。

□家人方面的阻力大不大？

■我的家庭非常單純，搞工運時我的父親已經去世了，我的父親是老國民黨員，有人說：張緒中的父親若沒有過世，可能他就沒有辦法出來搞工運了！這是實情。

我的母親是經歷過二二八的，她親眼目睹二二八的發生，我的父親就是躲避到她家才成就這一段姻緣的。在我小時候她常說：囡仔人有耳沒嘴！

可是我母親基本上是一個非常堅強的女性，我父親五十歲才生我，我母親又不識字，他們那種結合在那時代來說非常普遍，那樣的認知差距之下，她應該會很反對。可是她有台灣女性傳統的特質--咬緊牙根我一切扛起來，也要把孩子帶大。所以基本上她已經有遭遇過那一段白色恐怖的歷史，碰到這種事，她講你會講你。但基於愛烏及屋的心理，她會說我囡哪有什麼不對？！也有檢調人員到我家來搜，她年輕時都碰過，那時我還在讀成大外文系，通車又半工半讀，家中只有我母親，你說有沒有困擾？！

我工運搞了一個段落，77年才結婚，我太太是那一年跟我同時當選工會代表，她那一年當選全國總工會代表，就是這樣一個機緣，

應該算是蠻幸運的！

□我們都知道去年底中華電信工會的改選非常激烈，可不可以談一談？

■我這次在選舉過程，其實是國民黨和民進黨少部份公職人員聯合對我反輔選，民進黨的部份公職人員，因為我在選舉過程不願接受黨派的控制而抵制我，我的政策是我應該超越黨派的利益之上；至於國民黨社工會說：要投就投給台灣人！還說張緒中是新黨的。在勞方陣營這樣散佈，在選舉過程這樣分化我們的幹部。其實我的勞方角色從來就沒有人懷疑，而且在南部，你很少看到，搞勞方的外省人，這個比例是非常少的，除了幾個國營企業的，我們知道的趙健民、劉珩、姚國建、張鳳和……等，因此我很珍惜我這群兄弟，他們曾經為我拒絕過無數的誘惑。

□面對公營事業民營化的壓力，國公營企業的工會有什麼串連行動？

■5月30日我們剛召集各工會理事長，趕快送有關〈產業民主〉的單條修正案，記錄今天做好，各工會理事長都來。

那天還不錯，各工會理事長--台肥、公賣局等國公營工會六、七個理事長都到，都已經做成決議--〈產業民主〉單條修正第35條也已打字打好了。現在我們也成立了國會連絡人，各工會派一人，6月14日要開第一次會議，是有計劃地在做，不只是限於口號。我們是用明確的目標在定點要求，要求在短時間內做出一個績效出來，這樣會重振國營工會的信心。像這次公賣局會出來，就是他們做了一個很成功的遊說--《煙酒管理法》，是我們和他們一起做的，因為一次合作成功，彼此建立信賴感。其實他們的理事長還是國民黨的，可是建立友情之後，很多話都聽得進去了。這樣通過交誼，意見交換之後，慢慢就走得出來了，我覺得真正原因是因為大家都有危機感，他想借助別人的力量來幫助自己，工人本來就是互助嘛！

□基於什麼想法，想串連各地產業總工會？

■各產業總工會的結盟，目前只可算是剛開始而已。當初只有電信工會高雄分會參加，高雄市產總的成立，我們當初是主導力量之一

，當然幕後推是高雄勞陣。高雄分會是唯一突破參加產總的，那時是我當常務理事的時候，後來郵務、電信、石油、台電，這四個工會佔高市產總會員的一半，除了中鋼、中船這種特殊性的工會之外，高市產總會員工會幾乎都是幾十人或幾百人的工會。但石油工會有六千多人，電信工會有三千多人，郵政有二千多人，台電也有上千多人，所以那股力量當時讓高雄市勞工局及國民黨高市黨部非常緊張，說分會不是法人組織，不能加入。但經過我們遊說、拜訪，基於社區生命共同體，吳敦義才點頭了。

另外一部份的參與 -- 很多人對我不能理解，現在我是高雄市教師會籌備會的顧問，我現在等於是在幫教師組工會！我同時也是高縣教師會的顧問，這也是一個機緣。我的一位理監事，他的太太在當老師，他們老師在籌組教師會時，電信工會高雄分會名義捐五千元給高市教師會籌備會，我們早就在高雄做這種串連工作了。

我們認為，如果老師都懂得集會結社，台灣的勞工教育不用做得如此辛若，就已經成功了。所以我在和各工會的串連上，我對教師會的期望遠遠超過對國營企業的工會。因為若一位教師的觀念和我們一樣，他可以教多少孩子，這才是未來工人對自我尊嚴的肯定，也是未來的工人能對權利意識主張的一個根本源頭。

各地教師會的籌備進度大概跟各地產總的進度差不多，大概有五、六個 -- 台東縣、高雄市、高雄縣、台北市、台中市，他們現在成立全國教師促進會，也請李遠哲先生來參加，他們計劃在年底會員數大概會超過半數。所以我們經營的面不只是產總的結合，我們甚至跨越到不同領域的結盟。不同領域的結盟，有助於改變傳統觀念 -- 有些職業是高貴的（教師）、有些是卑賤的（工人）。我們的做法是先付出，我們打入他們裡面做勞教，也是一個機緣，否則以我一個基層工人，如何去對教師做教育，但是在工會組織籌組工作上，我們比他們多走一步，所以他們願意邀請我們提供經驗。這樣我們也非常樂意做這樣的結盟與連繫。

所以我們所做的結盟工作除了產總的地區結

盟之外，還希望跨出不同的職種，教師會是一項嘗試。這些嘗試都是基於一個理念，也是當初我們在高雄的一個口號 -- 「工會社會化，關心公共事務，產業民主化，參與經營管理」！其實這也符合管理潮流，叫做「全員管理」，這個方向到目前為止證明是對的方向，我想未來應該都是對的。這就是我認為經營工會必須挑一個清楚的奮鬥目標，讓工會幹部和會員有一個共同方向，才有後來的504、518、524行動，我們工會的動員與配合都非常好。

□從504到524，中華電信工會都有積極的參與，你個人甚至於518當天擔任第一大隊總指揮。但是這一波的運動被認為是中產階級的市民運動，請問你如何定位工會或個人在這波市民運動的參與？

■518當天我會被邀請擔任第一大隊總指揮，我個人都嚇一跳！因為不容否認這一波的運動有很多團體，包括政治團體的運作。我去開過一次工作會議就知道，518的前一天，他們希望我接總指揮，但我還沒有決定。他們說既然你是第一大隊，第一大隊好像是種籽明星隊，因此叫我。當時我還懷疑為何叫我？因為504時我是基於我自己有二個女兒，對他們的訴求我感同身受，但我遊行時有戴著中華電信工會的帽子，我戴的原因是我希望將中華電信工會帶上社會，就是「工會社會化，關心公共事務」的體現，以行動去實踐。所以他們工作會議決定後，打電話到南部通知我時，我正在做勞教，他們告訴我說決策工作小組希望我擔任總指揮，我說為什麼是我？我想可能是504我們是唯一一個工會團體參與連署、遊行的。

其實518現場我還試圖推掉（總指揮的職務），因為我不是一個喜歡收割別人的稻子（成果）的人。但是他說基於兩點考慮才邀請你，第一：你年紀比工作小組的年輕小伙子平均大十歲；第二：你領導電信三法的抗爭，大家有目共睹，甚至警方對你處理群眾場面的經驗，都認為你可以信賴的。

518遊行我們工會會員實際上去將近六百多位，高雄有另外一隊參加在高雄的遊行，也是發起單位之一。南北加起來有七、八百

人以上。這樣子的動員力相當可觀，因為是在沒有誘因之下，而且反而是外縣市來的比較多，其實北部很多會員沒有走在隊伍裡，但是他遇到我，都向我說：我也是電信員工，所以這樣的參與對會員和工會都有重要意義。

□談到工運派系，假如台灣工運派系可分為：統派、獨派、和不統不獨派，你個人對這幾個工運派系的觀察和比較？

■以我個人接觸的經驗來談，勞陣算是獨派參與工運的代表。我認為他們與工會的接觸先以關懷的方式，先伸出援手來協助你，屬於溫情主義的。這種方式對國營企業的工會是有用的，因國營企業員工本身勞動條件還不錯，早期更沒有所謂的勞工意識，日子那麼好過，若沒有民營化的壓力，根本不會有危機感。

我現在想不起來怎麼一個機緣認識勞陣的，可是它確實給了我很多成長的機會，在成長過程中我們辦了很多勞教，在我擔任高雄分會常務理事任期最後一年（96年）的時候，我就引進工委會。因為這時候，我們的幹部或會員已有比較清楚的勞工意識，而鄭村棋的東西是清楚的，因此獲得幹部及會員很好的評價。

基本上，勞陣與工委會若能撇開統獨意識不談，我想對建立台灣的勞工意識都有很大的幫助。可是站在工會的立場，應該選擇誰先誰後，工會的領導者應該很清楚。勞陣是很溫情的，鄭村棋是強調「鬥」的意識，人際關係是非常緊繃的，幹部之間是用互相挑戰的、互相顛覆的。這種方式對我們這種受傳統教育而且日子過得不錯的工會幹部而言，會認為何必這麼緊張幹什麼？所以選那一個系統幫你的工會做勞教，工會幹部應該看你工會的體質和會員的需求。

其實除了工運系統之外，我選擇勞教的師資不限於搞工運的，政治方面我也請。包括：王建瑄、陳文茜、莊淇銘……等。我是認為勞工在這個社會應該多元化接受不同的東西，他才有可能自主。當他不能接受多元化的觀念，你說他自主我覺得這是有疑問的。到目前為止，這兩個團體對我們工會都有貢獻

，勞陣當然是貢獻比較多（因為接觸比較早）；工委會是比較後來，是在一些工運場合看到工委會在幾個勞工議題的表現，他們有他們的特長，站在我的團體立場來講，我選兩者的特長來彌補我工會一些發展的需要。所以你說我對兩個團體有沒有偏好，基本上我是沒有任何偏好的。

照理說，勞陣我應是較接近的，但上次鄭村棋他因蛋洗衛生署被起訴，我還以理事會決議捐十萬元給工委會。但到目前為止，勞陣我不但沒有捐任何錢，我用的工作人員還是紅燈左轉的年輕人。另外我們電信總會以代表大會通過捐十萬元給福昌、東菱等關廠工人……等等，我覺得工會幹部應該要知道什麼該做，就去做。（□你個人或工會目前與兩個團體同時維持什麼關係？）■我覺得應該還是互相合作的。如果我有能力，可以提供一些資源，例如：我現在幹部就是與勞陣發生路線之爭的年輕人，如副總幹事韓仕賢，是過去紅燈左轉那一批人，現在準備再進來的，也是紅燈左轉那批人。若站在勞陣的立場，這是和勞陣有不愉快的，但我認為我現在有資源可以提供給對社會有理想的年輕人一個發揮的空間。我只要告訴來我這邊的人我這個團體現在的需要是什麼，第一。他本身過去就有在這個領域貢獻過，他年輕又有這樣的專長，我張緒中又有這樣的資源，何況，這個資源又不是我張緒中個人的，我為什麼不能提供一個舞台讓年輕人能夠展現他的理想？！這樣我的團體也受幫助，他個人也得到一個實現理想的機會，不是很好的嗎？我只要用一個人，我從不care別人的看法，我深信「用人不疑」，至於別人會問這樣會不會破壞你和另外一個團體的關係？我從不認為是這樣的，（□你個人可以不這樣認為，但客觀上有沒有影響？）■有，但沒有直接告訴我，透過旁人而聽到好像對你張緒中不太滿意，只要沒有當面告訴我，我就當沒有這回事。

因此對於工運各派系，我的態度就是只要你不和稀泥，不鄉愿，今天你太求這個位子，你就會想面面俱到，什麼人都care，care的結果，就癱瘓了，就腐化了，未來我就會做挑戰這些團體的想法跟做法。我曾經想過我

們工會團體為什麼每年五一不是跟勞陣走？就是跟工委會走？走這邊會得罪那邊，走那邊會得罪這邊，為什麼這樣？我想這種現象是存在的，我們現在要自主，我們應該換一個新的思考模式！新的宣傳手法！新的運動手法！以獲取更多人的認同和認識工會的本質是什麼！？我想這是比較重要的。我覺得工運團體應該進入「服務的競爭」或「理念的競爭」的時代！如果我的理念符合絕大多數人的需求，就會吸引更多人來加入我的陣營。如果一個團體付出很多，但人卻越來越少，那這個團體就要檢討了。現階段的工運應該開創更大的格局讓人覺得走這條路不僅是為自己也是為下一代。因此，檯面上的領導者當務之急是創造工運的誘因，讓更多人願意走到工運這條路來。

至於勞動黨我接觸得較少，羅美文僅有在遠化罷工我去聲援時認識。至於勞動黨和勞權會的理念和走向，我較不了解。但我的感覺是用的語言離社會的脈動很遠；另外有一個統派的思考框框讓她好像無法突破，而且是在本土意識這麼強的環境中，再加上民進黨地方公職人員對當地的工會團體或工運事件都有介入。因此我的感覺是勞動黨在工會間的接受度較低，當然這是在高雄的觀察。1995年五一高雄遊行，工委會、勞陣與勞動黨的關係非常緊繃，那時我對工運不是那麼的了解，但在開會時就可以感受到團體間的緊張關係，讓我感受到我在處理各團體之間的關係時要特別小心！我以前都沒有這樣的戒心，甚至覺得在被訪問時都有被設計的感覺。但是最後仍在「大家一起走」的大團結場面中結束，我覺得那是大家在學習怎麼整合，那一次我不認為是失敗的，因為最後沒有分，還是一起走，那才是一個成功！才是不容易！

□可不可以談你的工運理念？

■我非常注意運動方向和經濟發展的互動關係，今天在台灣你不考慮這因素，你沒有贏的本錢。當政者不斷要你接受自由經濟的思想，若你貿然將基層工人不熟悉的東西帶入，他會告訴你，那有可能的事？！所以我們工會現在在推「產業民主」的概念，這概念對變化中的國營企業來說是再貼切不過了。它現

在發生的一些弊端，用「產業民主」的想法去做是可以取得正當性的，這正當性基層會員是聽得進去的，只是目前媒體沒有大幅報導給予充份討論的空間，但未來我們這一波這樣做下去，我認為是有空間的。現在政治這麼亂，這一波民營化這樣做下去，慢慢大家會比較，這方式「產業民主」還是比原來的好，就會接受這個「產業民主」。這個就是機會了，如果它實驗成功，自由經濟那一套就不見得有用，我們是在以時間換取空間，往前邁進。

我認為從事工運一定要有使命感，像現在有一位同事跟我從高雄調上來，他是主管職，以後回去都不知還有沒有他的位子，而且他的小孩都還小，才3、5歲，所以使命感很重要。有人說我們是用高道德標準在做工運，我不否認，但我認為我們不這樣做，我們沒有任何機會。

□談一談電信工會選舉的過程？

■他們將選舉刻意拖，連黨部的委員選舉都配合工會選舉來拖，將黨部委員的任期都延一年，以配合拖延工會選舉，好讓他們有改組的時間。所以資方與黨部的策略非常清楚，第一個他把黨部委員延任一年，本來應該在去年六、七月那時候改選，延到今年六、七月，（□爲了要跨越去年底工會改選？），工會改選正常應該在七月，後來一直延，是我們一直告，一直抗爭，不然他準備一直拖下去的。

那拖有二個好處：第一。事業單位的重新改組時，工會沒有力量去杯葛他，也不會有時間去關注它；第二。工會理事長是他控制的，也可以配合他。

但是整個工會改選可以說資方太大意了，而不是我們厲害。怎麼說呢？當初的電信三法抗爭，我們已經累積相當經驗，等於是一個練兵的前哨戰，一個熱身的機會，雖然沒有成功，但動員近一萬多人到立法院抗爭，實戰演練，等於是在找出選舉的樁腳。

□公用事業以往具有獨佔性，現在隨著自由化、國際化的腳步，逐漸喪失其競爭優勢，工會如何因應？

■一般以為各項電信規費都在調降，認為電信單位一定在賺錢，其實電信公司也希望營造這樣的假象，但我不這麼認為，（□那為什麼還要調降呢？），調降了空間才會出來，業界的獲利率才會降低。但它的後果是中華電信更沒有機會競爭！民間也是一樣，說買一支大哥大送一支大哥大，你說有可能嗎？大家在看公用事業的自由化的結果，眼前的利益先顧，但不知以後有一堆爛攤子等著收。

所以工會在面對公用事業的自由化，要先面對內部的經營問題。第一個，人事的單位生產成本，在自由經濟裡就講這個。民營化的呼聲怎麼來的？就是因為看到生產力低，造成無效率，無效率看到冗員太多的問題。所以工會要正視這些問題的存在。我認為站在人的價值立場看，人就是會老，人工作久了就是年資會高，所以才設計退休制度、老人福利……等等，而不是現在用的鋸箭法，不能用的老人把他幹掉，那這就不是人的社會。應該是說他年紀大了，到一定程度有優退的規定，讓他順利的優退，這才是一個對人的價值肯定的社會。否則青春用完了，就把老的丟掉，新的再引進來，那不是一個健康的社會，那種競爭是一種惡性競爭，不把人當人看的競爭。所以基於人的價值，應該是說，國營事業有很多浪費的費用，是工人享受不到的費用，政治結構產生的費用，這些應該要砍掉，這樣成本才會降低，如此個別產能就能提升。

我們工會為什麼現在認為「產業民主」那麼重要？我說國營企業加起來，三個五百億，來做社會福利都還有剩，而且對國營企業都沒有影響！但是這樣誰敢做呢？這已經不是國營企業的問題了，而是立法委員的問題了。在談國營事業民營化時，最不正當性的就是立法院審查預算的結構。舉例來說，預算制度根本是用喊價的，然後再刪，國營事業預算怎麼編的？先想今年立法委員有可能跟我刪除多少錢，譬如一百億，我就多編一百億等著讓他刪，可是怎麼知道他沒刪這麼多，才刪了三億，多編的九十七億怎麼辦？這九十七億員工吃得到嗎？吃不到，可是無形中個別產能又降低了，整體費用又升高了，這才是目前國營事業最大的問題。

另外一方面，雖然獨佔性降低了，但還是有一部份存在的價值，例如。基本網路。所以最近我們就在挑戰民進黨的立委，既然要搞自由化，還怕什麼電子木馬屠城計，他說中共的資金已經進到台灣市場來了，但是我認為你緊張什麼呢？自由競爭不是不要管這些的嗎？我們最近就是在挑戰民進黨林姓立委，因為他是民進黨中主張公營事業民營化最力的一位，也是一位自由派的學者。

自由競爭就是有錢、有人、有技術就可以做了，不是這樣嗎？自由經濟不是無國界嗎？不是強調地球村嗎？那怎麼還被國家意識所影響？那不是矛盾嗎？最近我在非凡頻道與吳惠林交手，我說現在不是什麼丟到市場機制去就可以解決，那還要國家做什麼呢！？所以這些自由經濟學者自認為自己是專家，而他們的主張就是什麼丟到市場去就可以解決了。所以今天不管是公積金或退休保險制都是勞工要拿錢出來，你們雙方（學者、資方）一個不用出錢、一個少出錢，當然他們贊成了。今天我代表勞工來出席，你們就是要我跳進你們設計好的框框裡，而且還用一個學術的包裝，看起來好像很崇高、很神聖的樣子。所以我希望工會幹部都能用批判力去反駁這些學者的言論。

□可不可以談談你如何經營工會？

■我看一個工會健不健全，就是看她還有沒有在發紀念品。我非常重視勞工教育，電信工會全省總共有52個分會，多則七千多人，少則六十幾人，平均也有四、五百人左右，我這一任三年內，我的設定是在勞工教育。勞工教育不限在靜態的上課，任何一場抗爭也是一場勞教，爭取權益的過程也是一場勞教，至於平時西線無戰事時，就是不斷地辦勞教，聘請不同領域的人來上課，促使會員和幹部產生多元化的思考之後，勞工未來才有贏的本錢。這就是我經營工會的基本方法：就是勤跑！勤於做勞教！

另外我覺得工會幹部需要有靜下來的時間，出去在檯面上我一定像無敵鐵金鋼，但是自己靜下來覺得有被掏空的感覺，有很強烈的吸收新知的慾望，但是卻沒有時間。我接收了一個國民黨控制四十幾年的工會，我不僅讓她運轉，而且運轉得非常快。外面的活動

也要參與，裡面也要顧及，我們幾乎是用拼命的，我和幹部幾乎每天沒有到十點沒有人回去，但這不是正常現象。到一定時間，一定要趕快改變策略，讓我的幹部和我一樣，各分會也應該有能力能自己做勞教。另外我還有一個「工賊」的官司在那邊，因此我告訴我的幹部要有隨時準備接我的棒子的能力和心理準備。

財務方面我現在沒有支領資方任何差旅費，我和其他幹部在跑工會事務時，完全反映成本在工會財務報表上，讓會員有概念，你要工會為你做事，就要付出代價。我每個月拿你薪水的千分之三，不是白拿的。只有會員支持工會

，工會才能獨立於資方的掌控，否則一方面拿公司對工會的補助，一方面又跟資方爭取一些東西，又跟他作對，你想天底下有可能有這種事嗎？！

另外會務人員盡量能外聘就外聘，而且盡量能聘到高學歷就聘。原因是我剛接任那時候，主要幹部都歸建回公司，我向公司要一些人，都要不到，那時是我最難過的時候，我必須把自己的喜怒哀樂隱藏起來要去跟他週旋。到後來一部份人來了以後，例如我的總幹事（莊炳棠）來了以後，其他人我就要反映成本，四萬元聘一個人。我慢慢要在我三年任期裡面反映我經營工會的コスト，這樣我想這工會才會有自主性。

□有關「工賊」的官司，目前到什麼程度？你個人對這官司的看法如何？

■現在在高分院，已經快要宣判了。一審前後只有28天就宣判，但二審拖了將近一年的時間，原因可能是二審時我已經當了理事長了，可能是報紙大幅報導我們工會選舉的情形吧！我相信他們會比較慎重審理本案。

港都對民營化的反彈

/ 勞權會高雄分會

中華電信公司產業工會於5月9日舉行臨時會員代表大會，並通過下述三項關於民營化聲明之決議：一、堅決反對國民黨以「變賣祖產」方式執行民營化政策，並將結合串連各工會發動集體罷工。二、正式通過「中華電信工會罷工基金管理使用要點」，積極籌募罷工基金，作為發動罷工行動時的支援。三、對總公司強力施壓，促其要求電信總局應於6月10日前，將原電信總局全部土地交由中華電信承受，否則將追究董事長陳堯嚴重失職責任，及依法執行護產罷工行動。

中油為民營化人力過剩問題，積極進行多角化經營規劃，於5月16日舉行第二次多角化經營委員會委員會議，計劃高雄廠人力將由現行近四千人降至兩千五百人以下。對資方的作法，工會表示不反對多角化的政策，但要解決人力過剩的問題此非萬全之計，工會建議中油進行一貫作業煉油規劃，往中下游發展設廠，以此克服人力過剩問題。目前中油工會為反對民營化的大罷工抗議活動仍作業動員中。

但是資方的預言是很準的，當初一審要宣判時，國民黨的幹部就說會判得很重！果然就判了四個月。這毀謗罪除了當初雷渝齊的一年二個月和陳水扁的八個月這種政治性案件外，我這四個月算是最重的一就只講了一句「工賊」兩個字就被判了四個月。

對這官司的看法我是認為他們如意算盤打錯了，當初在選舉前他們準備用這官司把我套牢，好讓我們的力量潰散掉。這段日子是我最難熬的，誠如律師告訴我，法院是有錢人在玩的，勞工沒有本錢和資方上法院，現實環境就是如此無奈和無力，但是我堅信我做的是對的。

□對本刊的批評及建議？

■勞動前線的大小不方便攜帶，是不是可以不要那麼大？現在好像是A3的紙，放在雜誌架上會突出來，放不進去，那不是正常的size，可以差不多像《新新聞》那樣一般雜誌的大小。